

晚清中国教育改革

Kampol Piyasirikul¹

提要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开始对国家屡次进行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教育改革便是清政府始终十分重视的一项措施。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在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至 1905 年废除科举及设立学部期间的重要教育改革举措。在着重利用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将从晚清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指导思想、领导势力以及改革的进展与曲折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

关键词：中国、教育改革、晚清

1842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朝野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知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主动翻译《四洲志》，以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现状。后来，其良友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力求征集历代史志以及中外古今著述，编纂了《海国图志》。他在《海国图志叙》中表示，编纂该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²。这是中国人首次呼吁“师夷之

¹ 泰国皇太后大学文学院教师

²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页 2。

长技以制夷”的提出。他还强调学习西方、了解其情况的重要性。“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³。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民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朝覆灭，清朝历经了同治、光绪及宣统等三位幼帝的统治，而清廷政治实权则曾长达四十八年掌握在保守派领袖的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太后掌权期间，清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以及顺应国家需要的潮流，从六十年代开始便展开了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清廷掌握实权的封疆大臣，如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在从事洋务活动中，不仅积极主张效法西方，在军事和实业上提倡兴办军工、筹建北洋海军、筹办官督商办企业等，而且很重视教育，提倡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举措。

1861年奕訢等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中说明培养外语人才的必要性。“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同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由此，他们奏请广东和上海各督抚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士，“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

³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页3.

习”⁴。经清廷批准后，奕訢等于 1862 年 8 月上《遵议设立同文馆折》奏报已延英人包尔腾为西学教习，但不准其传教。再延汉人徐澎琳教习汉文，“并令暗为稽察”，于上月“先令挑定之学生十人来馆试行教习”，“即以此学为同文馆”。⁵由此，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外语学堂“京师同文馆”宣告成立。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便是中国近代史新式学堂的开端。

京师同文馆始创先设英文馆，后来又增设了法、俄、德、东（日）等外文馆，主要教授外国语言文字，以培养精通外语人才。除此之外，还有经奕訢与顽固派大学士倭仁争辩激烈后才得以设立的天文馆。其课程也从外国语言文字学扩充到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天文、物理等西方先进科学知识。随后，上海、广州、新疆、台湾等地相继仿照北京同文馆的章程设立类似的外语学堂。它们在教习西文、西学的同时，均强调中国经史之学，规定“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义”，于“西语西文之暇，仍以正学为本”⁶。

除此之外，为了适应军事以及实业上的国家需要，洋务派还建立了军事学堂与技术实业学堂，以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较为著名的军事学堂有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广东实

⁴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页 6。

⁵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页 6。

⁶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页 183，185。

学馆、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它们主要教授驾驶、制造、管轮、马步、枪炮等军事工程专业知识。在课程安排上，洋务派还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如 1887 年张之洞在其奏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奏折中，指出：“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⁷除在学堂就读外，他们还特别注重学生的训练实习。如天津水师学堂章程中规定：“凡学生在堂肄业四年，由北洋大臣大考，择其中式者，派上练船。在船练习一年，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习诸艺，诸能通晓。春考一次，秋考一次，如皆中式，准保以把总候补。”⁸在技术实业学堂上，洋务派在天津、福州、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了电报、医学、铁路、矿物等实业学堂，主要延聘了西方专业人士充当教习，以造就人才胜任当时各行洋务实业的职务。

洋务派在设立新式学堂的同时，还致力于派遣留学生的事业上。在容闳的推动下，1871 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开始筹划幼童留美一事。1872 年清政府批准派遣首批幼童三十人前往美国留学，直到 1875 年每年各派三十人，共四批一百二十人。这些留美学生学习刻苦，并与当地的美国人和睦相处。而后来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说这些幼童到了美国后，“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

⁷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页 470.

⁸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页 454.

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⁹ 再加上当时美国对华工禁约的因素，清廷便于1881年将全部留美学生分三批撤回。幼童留美的计划就这样半途而废。

尽管幼童留美未能按原计划顺利完成，可是它已为后来的留欧学生提供了模范。在幼童留美之后至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以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体的官费留欧学生风潮。作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和李鸿章在这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选派了几批聪颖学生前往法、英、德等欧洲国家学习造船、驶船、水路军械技艺等。这些留欧学生勤奋好学、精益求精，取得卓越的成绩，归国后成为了中国海军、造船工业等领域的骨干力量，贡献了其青春和力量。¹⁰

综看十九世纪末洋务派所办的教育事业，可看到其办学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简称“中体西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在以学习中国传统儒学经典为主的同时，也要兼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

⁹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页921-922。

¹⁰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页181-183。

对“中体西用”这一概念作了较为清楚的阐述。他将“中学”称为“旧学”，而将“西学”称为“新学”，并强调“新旧兼学”，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¹¹由此可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就是使传统的经史儒学教育思想，吸取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引进了‘西学’和‘西艺’”¹²。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空前的民族危机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出现了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为宗旨的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他们把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和变法成败的战略高度。”¹³康有为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指出，西方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他还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的识字者比例进行比较，强调办学的重要性。“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者仅百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¹⁴

¹¹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页967.

¹² 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页45.

¹³ 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第2期第35卷.

¹⁴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页909.

至于洋务派所办的洋务学堂，维新派则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896 年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一文中分析指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¹⁵ 在梁启超看来，之所以洋务学堂培养不出“异才”来，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注重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的皮毛东西，而不学“其本”，即外国政法之学。

维新派十分积极主张效仿西方与日本的学制，兴办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学校。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奏请光绪皇帝效法德国与日本，制定学制，并“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¹⁶。光绪皇帝对此表示同意，曾谕令全国各省设学堂。并在其著名的《明定国是诏书》中，将开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一事列为戊戌变法的首要举措。

除了提出从省到乡设立大、中、小学的一套完整普教建议之外，他们还格外重视女子、师范教育。1897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论女学》一文中，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传统

¹⁵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页 933.

¹⁶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 中华书局，1981，页 305-307.

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人有恒言曰，妇人无才即是德，此誓言也。世之瞽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他认为只有使人人能自养，而不是一人养数人，这样能使国家富强。若能使中国妇女接受教育并执业，国家的生产总量也会随之而增一倍。他推理解释说：“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并下结论说：“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¹⁷

关于女学，1898年康有为在其著名的《日本变政考》中也有些看法。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兴办女子教育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日本变法，亦重女学，女生徒至二百余万。女教习至千余员，女学校至千余所，其教法与西国略通。盖恐其民之多愚而寡智，故广为教育，使男女皆有用。”而中国与其完全不同，中国两亿女子却无一所学校可习。这就等于放弃了国家一半人口的人才。“中国以二百兆之女子，曾无一学校以教之，则不学者居其半，是吾有民而弃之也。”¹⁸

至于师范教育，梁启超1896年在《论师范》一文中指出师范学校是群学的根基，并强调师范学校对培养学生的重要性。

¹⁷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页100-102.

¹⁸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页118.

“师范学校，与小学校并立，小学校之教习，即师范学校之生徒也。数年以后，小学之生徒，升为中学大学之生徒，小学之教习，即可升为中学大学之教习，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¹⁹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从戊戌变法以后，许多女子学堂、师范学堂陆续成立，如天津严氏女塾、广东一封女学堂、常州正村女子学堂、湖北武昌师范学堂、直隶保定师范学堂、贵州公立师范学堂等。

在书院改学堂方面，戊戌变法之前，已有一些书院意识到传统书院所教授的帖括词章，已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因而，他们开始对课程设置进行改进，将算学、天文、格致等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加入其课程安排，要求中西兼习。如陕西味经书院于 1885 年另设“求友斋”，章程规定：“其课以经学、史学、道学、政学为主，而天文、地舆、算法、掌故各学附之。至文章诗赋，则书院旧课所有，兹不复及。”²⁰ 后来 1895 年又创设“时务斋”，以让学生“人人心目有当时之务，而以求其补救之术于经史”为宗旨。其章程规定：“每日均作六时，以二时讲阅经史，二时习学西艺及西书，二时游息。……读西学诸书，均须能通其意，其中国无其物及其器者，书院设法购置，或更延请西人专门之师”。时务斋还重视学生阅读报纸，以增加其时务的见闻。

“《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新出各报，时务斋均

¹⁹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页 79.

²⁰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页 372-373.

拟购一分，俾诸生分阅。”²¹ 1898年5月，张之洞对湖北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进行课程改定，以“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改章后的两湖书院分授经学、史学、地輿学以及算学等四门，而经心书院分授外政、天文、格致以及制造等四门，要求“诸生于四门皆须兼通，四门分年轮习”。至于该两书院所改定的八门课程，张之洞认为，“皆系学人必应讲求通晓之事。”²²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对中国传统书院改学堂起了推动的作用。1898年7月3日，康有为上《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奏光绪皇帝将全国书院均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他还对筹办学堂所面临的经费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该办法就是要光绪皇帝下令各地方将电报、招商等局的滥费拨为学堂经费。“请严旨戒飭各疆臣，清查善后局及电报、招商局各溢款、陋规、滥费，尽拨为各学堂经费”²³。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奏折，并于10日颁发上谕：

“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

²¹ 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页373, 375-376.

²² 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页397.

²³ 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页439-440.

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闹姓捐，颇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著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²⁴

上谕颁发后不到两个月，若干省督抚纷纷响应，将书院改学堂的中央政策落实好。9月3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上《致总署书》，报告说湖北省城书院如自强学堂、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江汉书院等，近几年来已“渐次改章，酌照学堂办法”，扩充课程，兼习中学西学。“至省外各属，湖北通计十府一直隶州，现拟先设十一学堂，各就该书院所有经费斋舍改为学堂。”“此外通省六十七州县，已飭一律就所有书院改为学堂。”²⁵9月5日，山西巡抚胡聘之上奏，拟将省会令德书院扩充，改为省会学堂。次日，直隶总督荣禄也奏陈：“现在奉旨将各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当即督飭各该司道详加筹议。”保定的莲池书院与新设的畿辅学堂，分别改为省会高等学堂与保阳郡城中等学堂。另外，天津的大小书院共有六处，经过改章与归并后，改设了高等、中等学堂各两处，以及小学堂一处。²⁶9月21日，山东巡抚张汝梅也上奏汇报，已飭令省城几所书院，“即日改习经史时务实学”。至于各府州县应设立的小学堂，他已“迭经严札催办，一俟办有头绪，再行详细奏闻”²⁷。

²⁴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中华书局，1958，页4126.

²⁵ 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页442-443.

²⁶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页282-284.

²⁷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页314.

而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慈禧太后于 11 月 13 日则颁发了一道懿旨，命令停办学堂、各省书院照旧办理，并解释说书院与学堂实际上名异实同，两者之学是相同的，因此没必要将书院改为学堂。懿旨指出：“……又片奏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等语，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²⁸ 但到 1901 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时，清廷已不能不承认中国传统书院是无法为其“新政”培养新式人才的。于是，光绪皇帝于 1901 年 9 月 14 日谕令，“诸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上谕最后还特别强调各省督抚学政，必须“切实通飭，认真兴办”²⁹。

尽管清廷已颁布命令全国书院改学堂、设立各级新式学堂，可是中国传统科举考试仍旧存在。这不得不使书生们不学时务，仅顾习八股词章帖括，以应对科举。因此，科举不改，学校难以广兴。自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维新派，以及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发表议论，并奏请改革科举，甚至废除科举。

²⁸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页 4255.

²⁹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页 4719-4720.

从十九世纪末以后，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科举制开始有些变革，主要是增加了与西学时务有关的内容。1870年10月，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上奏《会同闽浙总督英制军奏请特开算学科片》，说明制造船炮的根本在于算学，因此奏请特开算学科。他奏陈：“其专长是学者，内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工二部，外而水师，关榷、盐粮诸衙门，及船炮各局差使，均以不可少之才，处适相当之地。其本系正途出身，兼通是学者，尤宜别加优异，以示殊荣，使以其学印证船炮要工，及驾驶核算各事，宜一一晓然于所以然之理。”³⁰ 1884年7月，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专门考选精通制造、算学、舆图等之人才，以供朝廷叙用。1897年12月，贵州学政严修向光绪皇帝上著名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他在奏折中建议开的“经济科”，指的是以内政、外交、格致、制造、法律等学组合为统称的一科。对于这些建议开设新科的奏折，清廷出于顺应时代潮流的考量均予以批准，并饬令相关衙门认真妥办。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强烈要求。他们对中国传统八股取士进行猛烈的抨击，认为它不仅禁锢了中国士人的思想，而且是窒碍国家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1898年5月，梁启超等上《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奏请光绪皇帝下明照，自从下科乡会试以及此后的岁科试均停止八股试帖。他解释说，国家官员都出自科举。据科举制度，士人将经历从地方的童生、生

³⁰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页650.

员、举人到中央的进士、翰林的考试过程。这是一个较为精致的筛选取士途径。因此，中试的进士、翰林按理该是国家的精中之精。“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³¹

6月17日，康有为上清帝《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在奏折中，他开门见山地陈词：“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夫八股之无用，臣即业八股以窃科第者也，从其业之既久，知其害之尤深，面对未详，敢为我皇上先陈之。”他进一步揭露说这些进士、翰林只懂得“八股清通，楷法圆美”，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更何况问其亚非州的地理或欧美的政局。于是，他一针见血地下结论说：“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并且要求光绪皇帝立废八股，乡会童试均改试策论。³²

六天后，即6月23日，光绪皇帝便降上谕：“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并解释说明：“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

³¹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页39-40.

³²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页36-39.

不随时改变，以破拘墟之习。”³³但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却下懿旨恢复八股，停止经济特科。“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³⁴

到二十世纪初，随着教育改革的推广，科举制再也不能在历史舞台上继续扮演任何角色。1903-1904 年，张之洞、张百熙相继带领上奏递减科举，建议自下届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并将科举递减之额作为学堂取中之额。1905 年 9 月 2 日，袁世凯等联名上《奏请废科举折》，强调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³⁵当天，光绪皇帝立即下了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³⁶至此，历经一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科举制，因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而最终不得不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这确实是符合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³³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页 4102.

³⁴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页 4220.

³⁵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页 111.

³⁶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页 65.

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另外两个重要举措是，颁发学制与设立学部。二十世纪初，各级各类的新学堂不断增加。各学堂均制定各自的课程设置、考试规定、学校管理等章程。这导致了各级各类学堂体系互相不衔接之弊，大大阻碍了新教育的前进。因此，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学制便成了迫切的需要。

1902年8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由清政府颁布。这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全国统一规定的学制。因这一年为旧历壬寅年，所以又被称为“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的拟定主要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的。除张百熙外，吴汝纶也对学制内容的拟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吴汝纶在答应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时，向张百熙提出先赴日考察教育的要求。他在日本进行教育考察时，随时向张百熙以及其好友提供日本教育方方面面的宝贵资料。后来，张百熙在主持拟定学制时，也采纳了他所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

《钦定学堂章程》将学堂分成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三个大阶段。初等教育包括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及高等小学堂三年等三级。高等小学毕业可升入中学堂。中等教育仅有中学堂四年一级。中学毕业可升入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高等教育分三级：一）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高等学堂设于省城，而大学预备科设于大学堂内，均分政艺两科。三年毕业后，

可升入大学堂；二）大学堂，分政治、文学、商务、格致、农业、工业、医术等七科，学制三年。毕业后经选拔而升入大学院；三）大学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以研究为主要任务，不设课程，不定年限，旨在培养专门异才。除此之外，《钦定学堂章程》还有师范、实业两个教育系统。实业学堂分简易、中等、高等三级，分别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的程度相当。师范教育分成附设于中学堂的师范学堂及附设于高等学堂的师范馆两级，分别以造就小学中学师资为宗旨，均是四年学制。另外，在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之外，还有为己仕官员学习新知识设立的仕学馆，学制三年。

“此项学制曾经颁布，但因学制本身的不够完备和清政府对学制的拟定人张百熙存有歧心等原因，所以没有实行。”³⁷ 尽管如此，可是它毕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学制，因此在近代教育史上也该占有一席之地。《钦定学堂章程》对以前各学堂各设课程等混乱状态，进行了改革。主要是规定了初等、中等以及高等教育循序渐进并互相衔接的学制系统。并将师范、实业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来，意味着清政府对其比较重视。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学制仅将师范、实业学堂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以及高等学堂，未能使其独立办理，并且未能具体对其开设课程等作

³⁷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页 170.

更为详细的规定。另外，在《钦定学堂章程》中并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这些大概都是该学制的不足之处。³⁸

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共同主持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由清政府颁行。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继《钦定学堂章程》后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学制。因这一年为旧历癸卯年，所以又被称为“癸卯学制”。虽然名义上是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共同主持拟定而成的，但实际上对《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工作最有所作为的则是张之洞一人。张之洞不仅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他有着几十年的办学实践经验。在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过程中，他在其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参考借鉴了其门下罗振玉在日考察教育所提供的资料。因此，从癸卯学制的内容中，不难看到张之洞的办学思想以及其效仿的日本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在普通教育上，分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内分三级，即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以及高等小学堂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五年一及。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内分三级，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年到四年、通儒院五年。除此之外，还有师范与实业两种教育的规定。师范教育分两级，即与中学堂程度相当的初级师范学堂五年，以及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当的优级师范学堂四年。实业教育

³⁸ 参阅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页299-302。

方面，属于初等教育性质的有艺徒学堂半年到四年、实业补习学堂四年，以及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三到四年。属于中等教育性质的仅有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有实业教员讲习所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另外，还设有译学馆和文言馆，均属于高等教育性质。还有为新进士设立的进士馆，以及为己仕官员设立的仕学馆，亦均属于高等教育性质。³⁹

《奏定学堂章程》是由清政府颁发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第一部学制。与《钦定学堂章程》相比，它在许多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尤其是师范与实业学堂的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将师范教育分成初等与优级师范学堂两级，并对其办理各方面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反映了学制制定者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此外，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实业教育大致可分为初、中、高三三个等级。这也不难看出，培养实业人才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急需。这些都是《钦定学堂章程》所未能做到之处，而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得到了弥补。但是，女子教育仍然未被纳入学制体系中。还有进士馆与仕学馆的设立，也是科举制对新教育的约束之象征。这些都是《奏定学堂章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封建残余痕迹。

在教育行政机关改革方面，晚清并无专门的、独立的掌管全国教务的行政机关。而是一向由礼部与国子监共同管理，其职能

³⁹ 参阅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页 311-312；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页 170-173。

交错，并不完善。清末教育行政的改革，是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新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1898 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据其章程的规定，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有统管各省学堂的职能。这样京师大学堂便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管学大臣也是兼管各省学堂的长官。而随着教育事务日益繁忙，设立专管全国教务一事便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于是，清政府 1905 年 12 月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学务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设长官尚书一人，左右侍郎二人。几个月后，又将国子监归并。并且，学、礼两部共同划定了各自管辖职能界线，大致为新教育归学部照新章办理，而旧教育仍归礼部管辖。在地方教育行政上，学部成立后，奏请裁撤各省学政。另设提学使司，作为省教育行政机构，并设提学使为长官。此外，学部又规定各厅州县均设劝学所，作为省以下的教育行政机构，内设总董一人作为其长官。这样清末从中央到地方的新教育行政系统已经健全。⁴⁰

参考文献：

陈景磐. 1980. 《中国近代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陈学恂主编. 2001.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陈元晖主编. 2007.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元晖主编. 2007.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董宝良. 1990. 《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 人民教育出版社.

⁴⁰ 参阅陆发春. 《晚清中央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沿革》. 安徽史学, 1996, 第 3 期; 汤钦飞. 《清末教育行政机构改革述论》.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5; 关晓红. 《晚清学部研究》.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关晓红. 2000. 《晚清学部研究》.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1958.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
- 李国钧, 王炳照总主编. 2000.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陆发春. 1996. 《晚清中央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沿革》. 安徽史学, (3).
- 舒新城. 1985.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 舒新城. 1985.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 汤钦飞. 1995. 《清末教育行政机构改革论述》.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汤志钧. 1981. 《康有为政论集》. 中华书局.
- 王晓秋. 1998. 《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2).
- 朱寿朋. 1958.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 中华书局.
- 朱有瓚主编. 1986.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朱有瓚主编. 1987.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ampol Piyasirikul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s begun reforming the country in many areas on several occasions. The motivation for these movements was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Among these areas of changes, educational reform was one of the reform policies that the Qing Dynasty Administration has significantly valued over those years.

This article studies some crucial educational reforms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time Imperial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was founded in 1862 and when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cancelled, as well as whe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05.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examination of a great number of primary historical documents, while focusing on the main points abou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ain concept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power groups in the administration, progressions and obstructions of the reform, and so on.

Keywords: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late Qing Dynasty*